

中国近现代史上，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在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倡导女性教育的风潮。从中国女权运动的领导者唐群英、张汉英到新中国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、蔡畅；从创办女校的先行者许黄萱、曾宝荪到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、教育家劳君展；从考古学家曾昭燏到现代生殖学家卢光琇……在这些湖湘女杰的身后，有着启蒙智慧、培养女才的“摇篮”女校。今日女报/凤网推出《湖南女子教育的前世今生》专栏，从藏于时光深处的这些女子院校的前世今生，回溯湖南女性教育的高光时刻。

■湖南女子教育的前世今生

湖南第一所民办女校：
葛健豪、蔡畅是首届学生

文/胡桂香

光绪三十年(1904年)，慈禧太后准许在中南海内设立女学，学习中西文。这一消息传开，便给教育界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其时，长沙的一些报刊，如《湘报》《游学译编》《湖南教育杂志》《大公报》《实业杂志》等经常刊登反映新的教育思想的文章，报道教育改革的相关消息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湘乡会女士曾广镛(人称李夫人，系前内阁学士李光久之媳)捐资4万元及其夫所遗南州田产，于长沙城内千寿寺开办淑慎女子学校。在淑慎女学举行开学典礼时，湖南巡抚赵尔巽前去祝贺并讲话。他称赞李夫人“捐产兴学，大起宏规，排众议而独行其志，概乎未之前闻”。淑慎女学可以说是近现代湖南第一所民办女校。

淑慎女学堂教学“以修身为经，体操为纬”，“继之以经、史、舆地算学，习手工、讲保育”，“进而求专门物理医学之微，格致制造之术”，“其所援引入学者，多名门闺秀，可为我国贵族女学的先声，入学学生达184人”。当时，时年12岁的曾宝荪(后来创办艺芳女校)被聘为该学堂英文教习。但创办不到一年，学堂因守旧封建势力的攻击和经费不足等困难而停办了。

1908年，曾广镛将淑慎女校移至湘乡行台公馆，继续办学。1912年淑慎女子学校改称县立两等女校，1913年春改称县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，创湘乡女子职业教育之始。

1926年至1935年，学校发展较快，买下学校毗连的民房，扩建校舍，可容纳300多名寄宿生；同时调整教学内容，文化课与普通初中班相同，实科设立编织、缝纫、染织、刺绣四科。为使实业科的学生真正学到技术，学校从上海购入先进的织布机，从长沙聘请技艺高强的实科老师，刺绣科学画又学绣，染织科学织又学染，生产的刺织品和提花手巾被销往省城。为培养相关师资队伍，学校又增办职业师范班，加学心理学、教育学，培养职业小学教师，深受社会欢迎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因日寇不断犯湘，学校两度被迁移。1940年至1942年，学校迁往今山枣镇厚龙湾；1944年9月至1945年9月，迁往月山镇月山湾。抗日时期，师生走出学校开展募捐活动和救亡活动，为宣传抗日、支援前线做了大量的工作。

1946年至1949年8月，王礼中任校长，这段时期小学停办，初中保持6个班，实业科调整为缝纫、会计两门，任学生选修。王礼中是中共地下城关区工委委员，他聘请县工委副书记胡开炯，区工委委员彭久炼，地下党员曾冲、柳官铎、田学达、李声金、王砺金等先后在校教课。于是，女校便成了湘乡地下党在县城的活动场所。

1949年上学期，地下党在校更为活跃，策划和组织了“4·12”城区中学生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的示威大游行，参加的有6所中学，近3000名学生，女校师生充当了这次活动的骨干。在迎解、支前工作中，女校师生作出了重要贡献。1949年10月，党派王砺金接手该校，续办一年。

1950年2月，东山初级中学并入，县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改称湘乡县立第一初级中学。1952年12月13日，更名为湖南省湘乡第二初级中学。学生由1951年的6个班(200人)发展到1953年的12个班(530人)。校园面积由一女校时期的10亩扩大到28亩。1958年，又改成完全中学，名为湖南省湘乡第二中学，开始招收高中班。1987年湘乡撤县建市，确定名为湖南省湘乡市第二中学，沿袭至今。

湘乡第一女校淑慎女学办学四十多年，为祖国培养了大量人才。葛健豪、蔡畅是一女校的首届学生。后来，蔡畅成为国际进步妇女运动著名活动家，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，第四、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一、二、三届主席。蔡畅唯一的女儿李特特在这里读书两年，后留学苏联，回国后一直担任中国农科院研究员。

(本文选自湖南省妇联委托重大课题《湖南女性教育史史料收集与整理》，作者胡桂香系长沙师范学院教授、湖南省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)



在淑慎女校基础上演变成的湘乡第二中学，已有逾百年的历史了。

母亲如梅

文/袁姣素

母亲是家里的灯，是盆上的炭，是雪中的梅。“母亲在，家在。母亲在，天地都在。”这话说得真好，说到心坎上去了。

逢年过节的，便要回家去看看，母亲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展露厨艺。我们一起去街上买菜，母亲步履缓慢，气喘不已，我便不准她去，说自己去买回来便是。母亲不肯，嗫嚅着，就算陪我走走吧，你们回来一趟也不易。母亲兴致勃勃，我也只好依了她。母亲真的老了，银丝如雪，脸上阡陌交错，再不是以前那个明眸皓齿、号称“百灵鸟”的标致美人了。

记得外公说过，母亲曾经到他工作的九江铁路局待过一段时间，因为她喜欢唱歌，声音柔美洪亮，模样也生得标致，外号“小百灵”。当时有位年轻的铁路工直接跑到外公那里送一匹花布给母亲做新衣，并以此保媒，要迎娶母亲。外公有6个子女，全家都指望他一个人的工资糊口。母亲是老大，把她嫁出去了，口粮就可以给弟妹们余下，在铁路上还可以解决工作。然而，许是天意，母亲的命运不在铁道线上。

母亲虽出身贫寒，但读完了初中。她心灵手巧，几岁就会织布，帮外婆照顾弟妹，操持家务，16岁下放农村，嫁在农村，1979年回城，1980年安置在一个镇办的绣花厂工作。由此，我们姐弟仨也就随了母亲的户口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半边户”。

母亲成家之后，爷爷奶奶都相继去世，父亲又是独子，母亲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我们姐弟仨。幸亏她勤劳聪慧，在单位绣花是一把好手，还会自己裁缝衣裳，挣的工资总是最高，总算还能勉强度日。母亲绣的鸳鸯戏水、孔雀开屏、荷塘月色、傲雪寒梅等等都栩栩如生，让人爱不释手。尤其是梅花，堪称一绝，各种形态的梅花都能得心应手绣出风采，含苞欲放的、寒冬怒放的，早梅、冬梅、雪夹梅等等，形态各异，风骨万千，让人惊艳不已，在单位被称“一枝梅”。

母亲喜爱梅花，总以梅的风骨和精神告诫我们：做人要经得起磨难，守得住寂寞，受得了委屈。为人要诚，做事要端，要有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的品行。

记得有次母亲很晚还没回家，

姐姐看我和弟弟挨饿，便到外面去找吃的，那时谁家里都很穷，哪有吃的匀给我们？姐姐看到旁边菜地有几颗大白菜，便拔了苑回来，想洗干净了煮给我和弟弟吃。没想到，白菜刚刚洗好还没有下锅，菜地主人就过来了，一把夺过姐姐手上的篮子挂在屋门口的桃树上，气势汹汹地对我们说：“不许吃！等你们大人回来了给他们看看你们干的好事，街巴佬！”我们都吓坏了，姐弟仨抱成一团，瑟瑟发抖。

那时我们虽住在乡下，却没有土地，都是靠母亲的工资度日。父亲一个人的土地少得可怜，便给了他的异姓兄弟去种，自己到很远的洞庭湖区去做事，一年才回家一次。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喊我们是“街巴佬”，我们姐弟仨时常被村里的小孩追打，因为身份不同，我们住在这里好像有点跟乡村格格不入。

母亲回来后，在那人唾沫四溅、添油加醋的高声控诉中一言不发，脸色铁青。她搬了一架木楼梯过来，把姐姐吊起来绑在上面，又拿了根皮带出来，搬了根烧火凳让我和弟弟坐在一起，对面看着姐姐。母亲用皮带狠狠地抽打姐姐，我和弟弟吓得哇哇大哭。直到姐姐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哀号不已，那人才满意地取下那篮白菜，扬长而去。母亲把姐姐放下来，抱着我们姐弟仨放声大哭。从此后，不管母亲回家多么晚，我们都饿着肚子，从不会到别人地里去看一眼。那一年，姐姐还不到10岁，弟弟4岁。

母亲有句口头禅：“各做各的人，各烧各的香。”尽管村里的人对我们另眼相看，她都不计较、不放在心上。对村里困难的贫困户、孤寡老人，她都会挤出口粮给他们送去吃的，逢年过节的，给他们缝制新衣服送去。慢慢地，村里的人们都喜欢上了母亲，不管男女老少也随着族谱开始亲热地喊她“满娘”。

后来，我们都长大成家了，条件也慢慢地好了。母亲因为多年的操劳，一头的青丝早已变成了白发，身体也每况愈下，小病不断，但她从来不会动不动就喊我们回去，总是悄悄地在家里熬药，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去医院看看。家里不管是谁的生日，也不管你回不回来吃，她都要过来弄一桌子的饭菜摆好，风雨无阻，雷打不动。

母亲姓曾，叫小梅，梅花的梅。